

# 北海古窑址与“海上丝瓷之路”的研究

■ 王 戈

“海上丝绸之路”，也称“海上陶瓷之路”或“海上丝瓷之路”。海上丝绸之路，最初是以丝绸为主，以陶瓷、茶叶等为次的海外贸易线路。到8世纪唐朝中叶，瓷器大量出口。到宋代，陶瓷已发展为与丝绸并列的出口商品，以至有中外学者称宋代以后繁荣起来的中国海外贸易线路为“陶瓷之路”，或“丝瓷之路”。在英语中，中国则成了陶瓷的代名词。

古窑址，是某一地区政治、经济与历史文化的见证物之一。据初步调查统计，北海市（一区三区）至少有30多个古窑址。上至汉，下至清，时间跨度两千年。而现在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窑址只有9个，其中有上窑、下窑、东窑、西窑、大窑、英罗窑、草鞋村窑、红坎窑、豹狸窑等。有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年代的窑址。其中下窑被列为省（区）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其余为市（县）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有一批如中窑、晚姑娘窑、岭底缸瓦窑、常乐缸瓦窑等新窑址，是近几年发现的。

北海的古窑址，大多位于沿海边沿或江河边沿，水上运输方便，瓷土、燃料和釉料都较丰富。不同年代古窑址生产的陶瓷器，除国内销售外，也有一部分通过“海上丝瓷之路”销往东南亚等地区。北海古窑生产的陶瓷器，已成为北海与国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。

## 一、秦汉古窑址与“海上丝瓷之路”

秦汉时期的古窑址，北海地区目前只发现一个草鞋村汉窑群遗址。

草鞋村汉窑群遗址，位于合浦县环城镇廉南草鞋村西南约几百米，紧靠西门江。该窑址发现于1989年，合浦县博物馆根据村民的报告到现场考察时，发现有数个馒头窑，成10个小型马蹄窑，在村旁的人工运河处，发现有较厚的汉瓦堆积层及红陶堆积层。发现有较多的汉砖、方格纹板瓦、公母瓦和陶瓷器皿等残件。汉砖，有些有纹饰。汉瓦，朝天面有乳钉纹，背面有绳纹。1993年，合浦县将草鞋村汉窑群遗址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98年12月，我曾同桂林古陶瓷专家李铨一起到该遗址考察，见庄稼地上散满汉板瓦、汉砖等残件，见到数个未发掘的馒头窑和一个马蹄窑，见到一段用汉砖砌建的下水道，采集了数块汉代的板瓦、筒瓦、汉砖及陶瓷片做标本。这些标本均为残件：板瓦两块。一残片长约30厘米，厚约1厘米，板瓦中间隆起，瓦背有绳纹，胎灰白色，质地粗松。另一块板瓦，胎灰褐色，厚约0.8厘米，胎质较坚硬，瓦背有绳纹。残筒瓦一大一小，小者瓦头宽约11厘米。两块筒瓦均有瓦头、有子口，龟背状，瓦背印有直纹、斜条纹等几种，有些纹饰粗有些纹饰细。汉砖两块。两块残砖均宽13.5厘米，厚2.5厘米至3厘米，汉砖的一面印有斜绳纹或方格纹，与合浦汉墓出土的汉墓砖相似。陶片。有黑衣方格纹、细网纹灰陶片和残陶罐多种。

从考察情况看，该处早期应是汉砖、汉瓦的古窑遗址。除烧汉砖瓦外，可能还烧陶罐等陶瓷器。

汉窑址尚未发掘，深层内涵尚不是很清楚。散落的成十座马蹄窑，也许是南北朝时期的窑址，不似是汉窑。其他几个未发掘的馒头窑，也许比马蹄窑时代更晚。有纹饰的汉砖，应是汉墓砖。草鞋村汉窑群，始烧于汉，延烧至何代，还有待发掘研究。

据《广西外贸志》载：“秦汉以前，今广西合浦沿海一带，已有私营的海外贸易。”官方对外贸易，合浦在西汉已开始，这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早已记载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曾命军队开凿灵渠，沟通湘江、漓江，连接长江和珠江水系，开辟了从中原沿湘江入漓江，经桂江、北流河、南流江抵合浦的军民两用水道，成为从中原通往东南亚、西亚、非洲等地最便捷的出海通道。从汉至唐的朝贡贸易，东南亚、西亚及罗马等国，大多也是沿着这条水道行走的。合浦港也是凭借这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，使对外贸易获得较快的发展。

据1965年第6期《考古》刊登的安志敏《马来西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》一文载，马来西亚柔佛州曾出土过许多几何印纹陶片。纹饰有方格纹、曲尺纹、雷纹、编织纹、波浪纹等，陶片的制法、质地以及某些纹饰，均与我国华南地区的印纹陶非常相似。越南的清化东山、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，也发现过和柔佛州相类似的雷纹陶片。安志敏认为，这些陶片很可能是通过外贸手段输入的。有几何纹饰的陶片，在北海地区除了在草鞋村汉窑群遗址有发现外，在地角岭炮台旁，以及在营盘镇西沙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发现。在西沙坡遗址，既采集有打制石器、磨制石器，也采集有汉砖、汉陶壶、汉板瓦、汉筒瓦，还有方格纹、水波纹、米字纹的印纹陶片，以及有唐、宋、明各朝代的陶瓷残器。

在北海地区，现查明，有新石器时代印纹陶的古遗址有几处，有丰富陶瓷陪葬的汉墓近万座（目前在汉墓保护区内有编号有封土堆的汉墓约1200多座，没封土堆的汉墓应更多，如1987年开建合浦四方岭汉墓区一段二级公路时，发掘了240多座汉墓，仅有13座有封土堆）。而汉墓所需的陪葬陶瓷是不少的，如1988年底，在北海孙东发掘的两座砖室汉墓，其中1号墓约用汉砖2万块，2号墓约用汉砖3万块。1971年冬，在合浦南郊望牛岭发掘的一座西汉木槨墓，出土陶器有37件。2001年7月，在合浦九只岭发掘的一座砖木合构墓，出土陶器43件。由此可见，秦汉时期当地生产的古陶瓷应是不不少的，古窑址也不应只有草鞋村汉窑群一个，这还有待今后的调查发现。

## 二、隋唐古窑址与“海上丝瓷之路”

隋唐时期的古窑址，目前只发现3处，即英罗窑群遗址、晚姑娘窑址、盐灶窑址。

英罗窑群遗址，位于山口镇英罗村东南约1公里处。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资料载，该窑在英罗水库岭脚下，南面以前是海，后来海岸线南移约1公里。据说，以前那里有72条窑，东起英罗圣堂，西至石乐埠，中间连着后来建的英罗水库大坝。窑群还伸入水库150米。窑群在英罗水库周围最密集，既有馒头窑，也有龙窑，表土的陶瓷碎片约有2公里。陶瓷片多施青黄釉或黑釉，无纹饰。广西文物队以前鉴定为唐窑，窑址上也有宋代器物。广西容县也有与英罗窑相似的窑址。在英罗水库大坝南北两侧，从北面的瓷片带到南面的废窑包，约有近千米。在大坝西南角，尚有两个馒头状废品窑包，窑包内径约3米多，存有大量烧坏的瓷碗。这些废品瓷碗，火候未超过1100℃，硬度不高，吸水性强，胎质粗松。在窑群周围，散落很多唐代的碗、钵、煲、罐、筷子筯等一类日用生活用瓷的残器或碎片。近窑包处有较厚的废品堆积层。

英罗窑群是一处较大的唐代窑址，有可能延烧至宋，因在窑群中发现有龙窑和宋代瓷片。其生产日用陶瓷的数量及器型较多，质量也较好。窑址以前靠近英罗港，运输方便。英罗窑群衰落的原因，有可能是因海岸线南移，后来运输不便，或者是以后因战乱、管理不善等原因所致。

晚姑娘窑址，位于南康镇晚姑娘村东南方，在南康江西面，西背矮坡，坡上有丰富的陶土。只发现一个窑包。地上瓷器残片比较多。从瓷片看，有大口碗、四耳罐一类的日用器皿。器壁较厚重，有些胎质粗松，釉色黄绿，较肥厚润泽，多有开片。罐、碗等器物，外部均施釉不到底。器物和英罗窑相似。在该窑采集的陶瓷标本有：大碗，形状扁圆、阔口、平底，碗足有些呈饼形，有些无圈足，碗口直径约14厘米，碗高4.5厘米，碗底多有如“6”字划痕，碗内底均有四五个垫烧痕。四耳罐，椭圆形，侈口，肩有四扁桥耳，器形与英罗窑相似。

煲窑岭窑址，位于营盘镇婆围盐灶大队煲窑岭，约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广东文物工作队发现，在钦州市档案馆钦州地区文教卷有记载。该窑生产的日用陶瓷与英罗窑、晚姑娘窑相似。该窑在南康江之西，近出海口处，距北面的晚姑娘窑约有3公里，水上运输方便。

据《合浦县志》载：“唐贞观八年（634年）置廉州，州境相当合浦、北海等地域。天宝元年（742年）廉州人口为13,029人。”从英罗窑、晚姑娘窑及盐灶窑来看，其生产规模较大，年生产陶瓷约有几十万件，当时廉州人口不多，当地解决不了销售问题，只有靠外销，才能消化得了生产出来的陶瓷产品。当时合浦口岸，不但出口本地生产的陶瓷，远在南朝时，已出口南流江、北流河等上游地区生产的陶瓷了。据《广西外贸志》载：“南朝时，我国商业繁荣，海外贸易比较发达，广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商埠。合浦是东南亚各国朝贡的通道。藤县古龙乡中隆村生产的古陶器经北流河、南流江输合浦出口。”

### 三、宋元古窑址与“海上丝瓷之路”

宋元时期，北海现已发现的窑址有：下窑、中窑、上窑、东窑、西窑、常乐缸瓦窑、黄丽窝缸瓦窑、红坎窑等。

下窑，位于福成镇下窑村，故名。窑群在古河道福成江（又称新圩江）西岸，西靠下窑村，南北长约300米，东西宽约100米。据合浦县文物调查称，该窑群在江岸排列有12个窑包，每个窑包相距三五十米。现在较为明显看出的窑包有5至8个。窑群大多为藤蔓、草木所覆盖。在窑包周围，瓷片比比皆是，废品堆积层较厚。烧造的陶瓷有罐、盆、碗、壶、擂盆等日用生活陶瓷。废品堆还有垫饼，匣钵、石锤、窑砖等窑具。瓷片有青、黄、灰、绿等釉色。有些影青瓷片釉色较好，呈黄色或青黄色，釉色滋润，火候较高，胎体坚硬；有些釉层较肥厚，有开片。

中窑，位于福成镇中窑村东北约200米处。在古河道福成江西岸，距南面下窑约2公里，距上窑约4公里。1988年12月，我与桂林市古陶瓷专家李铎到中窑村考察，首次发现该窑。因它在中窑村旁，与上下窑相对应，故名中窑。窑址附近多产陶土，废品堆积层较厚。见有龙窑和馒头窑的残迹。曾烧造过盆、碗、壶、钵、瓮、煲、擂盆、猪槽等日用陶瓷，也有骨缸等宗教用瓷，还发现有大缸、牛头煲等大件和明代城砖等建筑陶瓷。瓷片多灰白胎，施青黄釉，牛头煲施黑釉。大多瓷片火候较高，胎质坚硬，有些器物壁较厚。馒头窑是烧大缸、牛头煲等大件粗瓷的。城砖长40厘米，宽16厘米，厚约10厘米。明洪武初年，朝廷命修筑白龙珍珠城，该城呈长方形，南北长320.5米，东西宽233米，周长1107米，城高6米，城基宽约7.6米，是需要大量城砖的。白龙珍珠城的城砖应是中窑烧造的。中窑距白龙珍珠城约7.5公里，有水路相通。中窑村明代曾为集市，称中窑圩。明代后期，因遭倭寇劫掠而衰落。又因福成江河道逐年淤塞，水上交通不畅而使窑址停烧。



上窑，位于福成镇上窑村东南方约 200 米处，在福成江的西侧。据合浦县文物调查称，窑包高约 15 米，东西长 56 米，南北宽 54 米。1957 年 7 月广东省文物普查认定为宋代窑址。1980 年 11 月，广西区文物队郑超雄先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对该窑进行发掘。当时窑址的火膛及烟道已全部被毁，仅剩窑床中部约 11 米长。该窑床为斜坡式龙窑，长 50 米，宽 1.6 米至 1.8 米，窑壁残高 35 厘米至 45 厘米，窑室斜度为 25 度。废品堆积厚达 1 米至 3.5 米，其中以窑具垫托居多。出土的遗物大多无纹饰，有小部分有海鸟纹、蜜蜂纹、缠枝纹，图案化了的云雷纹、水波纹等。修饰手法是用毛笔描绘朱红色。有些器物朱书“福”“寿”“长命”等吉祥文字。出土的陶瓷器计有瓮、钵、盆、灯、执壶、擂盆、篲筒、动物、饼足碗、拔火罐、四耳罐等日常生活器物。出土的陶瓷残器有些釉色滋润，光泽好，火候高。有的器物底部一般都较厚重，平底，腹部较深。有些口沿为子母口。还出土有 3 件陶瓷烟斗和 1 个胎薄、釉细的残破小酒杯。

红坎窑，位于福成镇社坛村北面古河道福成江上游的西边，紧靠红坎岭，故名。该窑是于 1987 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，封土高约 7 米，南北长 15 米，东西宽 13 米，窑膛为灰色砖砌结构。整个窑包已为草木封盖，似馒头状。从窑包周围散落的瓷片看，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、钵、壶、盆等生活用器。陶瓷器火候较高，胎质坚硬，釉色多为石灰质釉，也有施釉肥厚的瓷片。

东窑，位于营盘镇东窑村的东侧，窑址分布在南北长约 400 米的村庄边缘地带。东窑村东西两侧以前都是古河道。据群众反映，东窑以前有 36 座窑。1983 年 10 月，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，发现有 6 座窑包遗存，龙窑的构架还清晰可见。烧造的产品有碗、盆、罐、壶、钵等生活用器，器物胎较厚，灰白色。釉色有青黄、褐黄等色。有些钵釉色滋润肥厚、胎质坚硬。碗外施釉不到底，有深褐色划纹。

西窑，位于东窑之西。东西两窑中间隔一条约 200 米宽的田垌（以前是古河道）。当地群众说，以前西窑也有 36 座窑。1983 年 10 月，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，发现有 8 座窑包，窑包附近散落很多筒瓦碎片。有些瓮、罐、钵等瓷片，产品胎质、釉色品种与东窑、上窑大体相同。

常乐缸瓦窑，位于常乐圩镇北约 1.5 公里的缸瓦窑村旁，南流江东侧。窑口面对江边。1999 年 10 月，我利用休假时间到该地考察时首次发现。因近常乐圩镇，故取名常乐缸瓦窑。该窑现存两条斜坡式龙窑，每条长约 40 米。一条已多年停烧被草木覆盖，陶瓷片满地皆是；另一条似在古窑的基础上修造窑床，停烧约有 20 年。两窑口周围废品堆积层较厚，产品火候高，多为厚重粗瓷，器物内外大多施酱色釉。烧造的器物有瓮、钵、盆、沙煲、猪槽、大缸等生活用器。器物胎质粗糙，含铁量高，呈褐色，胎质坚硬。古窑的东边有很多深坑，应该是以前取陶土时挖的。据一位老人说，这里很早以前便有缸瓦窑了。该窑烧造产品的胎质、釉色、品种与红坎窑相似。

黄丽窝缸瓦窑，位于南康圩镇北约 6.5 公里的缸瓦窑村东南方，因该地属黄丽窝大队辖，权取名黄丽窝缸瓦窑。于 2001 年 4 月 26 日，我与一位同事到那里调查时发现。古窑已被青树翠蔓所覆盖。看来窑址规模较大，不止一个窑口。该窑以前离海边很近，后来海岸线逐渐外移，现离铁山港海面约 2 公里。该窑周围散落的瓷片很多，估计废品堆积层亦很厚。从散落的瓷片看，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、钵、壶、碗、磨盆等日常生活用器。器物釉色青灰，胎质有些坚硬有些粗松。磨碎、瓷盆与福成红坎窑相似。

当然，各个窑口由于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不同，其烧造年限还是有差异的。如福成江边呈南

北走向的四个窑址，下窑处于福成江的下游，离白龙港口约6公里，窑址的生产规模最大；中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，离白龙港口约8公里，生产规模比下窑小；上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，离白龙港口约11公里，生产规模又比中窑小；红坎窑处于福成江的上游，离白龙港口约11公里，生产规模又比上窑小。据《合浦文史资料》第三辑“福成沿革”载，明朝以前，“海潮上涨，自白龙港口冲入福成江，溯江而上，直达福成圩东北角十余里处，那里有条村庄名为‘水尾村’……顾名思义，‘水尾’就是海潮上涨之终点”。这条水尾村，就在红坎窑隔江的对面。也就是说，以前是有海水涨到红坎窑江边的，它的陶瓷运输，主要靠涨潮水路，但随着福成江的淤塞，海岸线的下移，这几个瓷窑逐渐失去了水上运输线，也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。所以，沿着福成江而建的4个窑址，红坎窑在上游，失去水上运输线最早，因而生产时间短、生产规模小，上窑次之，中窑又次之。

北海地区宋元时期出现那么多瓷窑，每年产品至少过百万件，而当时北海地区的人口并不多，单靠当地销售是不可能的。据《合浦县志·人口》载：“元代合浦属廉州路，廉州路辖合浦、石康二县。该路人口为11,686人”，“到了明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合浦、石康二县总人口为33,007人”，“明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县境人口为11,822人”。由此可见，北海宋元时期，乃至延烧至明代的窑址，其生产的产品在本地销售，肯定是供过于求的。这些窑址之所以能生存发展下去，主要靠产品外贸出口。《合浦县志·经济篇》曾记载：“唐、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并出口。”李志俭先生主编的《北海港史》也指出：“元朝在廉州设市舶提举司，接待各国使者和商人，也吸引中原商人抵此贸易。这样，不仅促进港口的发展，而且刺激了廉州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……当时，合浦的陶瓷业已初具规模……元代古瓷窑址，大都在沿海地带……古陶及其器物的发现，充分证明此时合浦已大批生产较为优质的陶瓷器，并通过港口输送到东南亚各国。”

宋元时期，北海等沿海地区之所以瓷业兴盛，外贸兴旺，还有如下几个原因：

1. 宋朝廷重视海外贸易。①专门在广州、泉州等大港口设立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。在廉州，设有沿海巡检司，元朝开设市舶提举司，旧署在“州南十里中和坊”。“中和坊”可能位于廉州镇沿着西门江往南约5公里的九头庙一带。这些外贸管理机构的主要工作，是接送中外来往使者和商舶，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。②1010年，宋真宗辟廉州和钦州如洪砦为与交趾（越南）互市口岸，直至南宋灭亡，共200余年。这有利于北海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。③朝廷派内侍等重要官员到国外开拓贸易。④授商以官，对招商有贡献的商人赐予一定的官职。

2. 禁止以金银与外国贸易，在以物换物的交易中提高了瓷器在贸易中的地位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，到了南宋嘉定十二年（1219年），“臣僚言以金银博买，泄之远夷为可惜，乃命有司止以绢帛、锦绮、瓷漆之属博易”。这样，金银钱币不再用于海外贸易，而瓷漆丝绸成了海外博易的主角。外销的陶瓷，主要来自民窑，这就大大刺激了东南沿海民窑陶瓷业的发展。

3. 航海技术的进步，也促进了外贸的发展。主要反映在船舶指南针的应用及造船技术的进步。在宋代，广东、福建的造船业当时处于世界先进行列，据宋代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卷六载，宋代商舶木兰舟“浮南海而南，舟如巨室，帆若垂天之云，舵长数丈，一舟数百人，中积一年粮”，可见当时造船已很发达。有的船甚至可载千人。宋代朱或的《萍洲可谈》，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等书，都记载有罗盘的科学原理。航船根据罗盘、天象、景物等因素，可做科学的航海定位。航海技术

的进步为陶瓷的对外输出提供了交通安全保证。

4. 瓷窑烧造技术的进步，也促进了对外贸易及瓷业的发展。在宋代，据《元丰九域志》载，南宋时，有不少士民从中原往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的南方迁移。在南迁士民中，也有不少有制瓷技艺的手工业工匠。他们的加入，使南方瓷业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，都得到很大的进步。如对瓷土注意了选择、提炼和因材施教，在纹饰题材、制瓷种类、施釉颜色等方面都有所进步。在烧造技术方面，窑炉也从半倒焰式的馒头窑改为平焰式的龙窑。龙窑多以山坡或堆土倾斜建筑，窑长数十米，形似长龙。其特点是升温、降温都快，生产周期短、产量大、成本低。同时，还用上了观察窑温的火照（试温标）。瓷窑烧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，既降低了成本、提高了质量，又扩大了生产规模，促进了瓷业和外贸的发展。

#### 四、明清古窑址与“海上丝瓷之路”

明清时期，除宋元时期延烧至明的上窑、中窑、下窑、东窑、西窑和黄丽窝缸瓦窑外，明代始烧的有岭底缸瓦窑、沙田大窑和北窑、豹狸缸瓦窑，清代始烧的有赤江窑、小江窑等。

岭底缸瓦窑，位于北海市银海区靖海镇，岭底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缸瓦窑村西侧。因该窑毗邻岭底村公所，权且称之为岭底缸瓦窑。窑址沿着海岸边分布，南北长约几百米。该窑是我和桂林李铎于1998年12月考察发现的。当时访问缸瓦窑村82岁的卢翁，他说以前这里有四条窑烧缸瓦，他小时候已不生产了，也许在民国前已停烧。经初步调查，发现该窑有3条龙窑的痕迹，废品堆积层较厚。龙窑长约30米，窑室宽约2米多。窑床依海岸边的山坡而建。在窑址南方，有一深水大塘，这应是以前取瓷土时挖深的。该窑烧造的主要是日用陶瓷器，也有建筑陶瓷和宗教用瓷。日用瓷器有瓮、碗、钵、煲、坛、缸、杯、壶、瓶、盆、网坠、筒瓦等多种，大小器均有，瓷胎有厚有薄。

1999年5月15日，我在市文物所将该窑采集到的瓷片，拿给我的老师张浦生教授看。他说从魂瓶、壶等瓷片看，应是元代或明代的。碗的釉多泛青，有贴花，应是清代的。由此大体上可判断，该窑为明清窑址应是没有问题的。

上新大窑，位于沙田镇上新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大窑村内。据《合浦地名志》载，大窑村“未建村前，此地建有三座大窑烧砖瓦”，故名大窑村。上新大窑西北距永安城约2公里，西南距上新村公所约1公里。大窑遗址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，中间有一个大水塘，应是以前挖陶土时形成的。水塘周围有些古窑址，散落及堆积的瓦片较多。在水塘边也发现有缸瓦窑，所烧的有钵、瓶、壶之类日用器皿。散落的瓷片火候不高，釉质较差。

在上新大窑北面约4公里，还有一个窑址叫北窑，位于山口镇丹兜村公所东南方约1.5公里，据老人说，北窑与大窑所烧造的产品以及烧造年代基本相似。修筑永安城时，大窑和北窑均为该城烧砖瓦。据《珠乡风情录·永安古城遗址》载，永安古城于明代初兴建，“该城周长四百一十一丈，高一丈八尺，宽一丈五尺，城壕周长五百丈”，于明成化和嘉靖年间曾重修。永安古城的修筑，需要的砖瓦量是巨大的。大窑和北窑距永安城几乎相等，约2公里，分别位于永安城的东南方和西北方，均为明代窑址。

赤江窑，位于铁山港区南康镇石头埠村公所西北约2.5公里的赤江，临近铁山港海湾，水上交通方便。据《合浦文史资料》第四辑载：赤江窑建于清咸丰年间（1851-1861年），同治年间



(1862-1874年)由吴正仁三兄弟建“白砵窑”，厂号为“义和祥”，生产砵、盆、煲、缸等日用瓷器，而以白砵为主，白砵最负盛名。清末，赤江增建了“伯公窑”和“中间窑”，工人发展到200多人，有6条窑口和1条碗窑，年产陶瓷20多万件。产品有煲、砵、盆、碗、碟、缸、杯、壶等多种。民国期间，仍有六七条窑烧造，并组建了“同益公司”。赤江盛产瓷土（高岭土）。赤江高岭土含铝量占22%至30%，铝能耐高温。赤江窑除白砵外，沙煲也很负盛名，耐高温达220摄氏度至420摄氏度。赤江窑的产品具有耐高温、抗击性强、没有毒素等特点，远销国内外。毛主席纪念堂的壁雕也选择赤江的陶土制作。

豹狸缸瓦窑，明代窑址，位于合浦县石康镇豹狸村公所缸瓦窑村的北面，距缸瓦窑村约700米。临近武利江边，顺江水直下约4公里，便到直通北海的南流江，水上运输方便。烧造的器物有瓮、罐、缸、砵、盆、壶、磨砵等日用陶瓷。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登记，该窑包高约7米，长约60米，为龙窑。窑址周围陶瓷残片很多。

小江窑，明清时期属合浦县（今属浦北县），规模较大，所烧瓷器质优价廉，远销国内外。据《浦北县文史资料》第二辑载：小江窑建于明崇祯年间（1628-1644年），由小江人到景德镇学艺回来后建造的。所烧瓷器洁白轻巧，能耐高温。直到清道光年间（1821-1850年），在小江“马路坡先后建成瓷窑8条：张屋窑、上信窑、中间窑、老窑、四柱窑、高窑、广仁窑、塘角窑”，烧制的产品有碗、盆、壶、杯、花瓶等。青花瓷、五彩花瓶质量都很好。据请来的江西师傅鉴定，该窑瓷器质量仅次于江西瓷器。北海市收藏研究会的部分会员，也收藏有小江窑多件陶瓷藏品。

明朝时，北海地区创烧窑加上前代延烧的瓷窑已有成10条，以每条窑每次装烧器物2万件计，每年装烧2次，全年就烧造40万件。到清朝，北海地区还有两三个窑口生产，年产陶瓷也有几十万件之多。据《合浦县志·人口》载，明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，合浦县境人口为11822人；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合浦县境人口为15467人；清康熙七年（1668年），合浦县境人口为17048人；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，全县人口为26528人。按照当时的人口，明清时期陶瓷器生产若单在本地消费，肯定是供过于求的。凭着地缘优势，北海地区的陶瓷产业，显然是要通过“海上丝瓷之路”，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。

《合浦县志·经济篇》载，于清代及民国年间，合浦生产的“缸、盆、砵、砂煲等粗瓷及粗瓷碗，有部分出口”。写于清末的《北海杂录·商务》载：“每年九、十月间，有大海波渡十余艘，载镬（铁锅）、瓦器往星加坡。”瓦器，即陶瓷器。《北海口岸外贸志》也指出：“北海开埠后……当时合浦、北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。如小江生产的瓷器，质优价廉，每年有大量经北海销往广州……及至新加坡等南洋地区。”为何明清时期北海的古窑址还那么兴盛，“海上丝瓷之路”仍很通畅呢？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：

1. 明清两朝前期均国力强盛，中外贸易兴旺，为陶瓷业的发展和“海上丝瓷之路”通畅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据《北海口岸外贸志》载，那时“安南（越南）、占城（今越南中部）、暹罗（泰国）、真腊（柬埔寨）等国的商人纷纷抵廉州，与我国进行贸易。明朝大批商人亦从廉州抵东南亚进行贸易”。明嘉靖年间（1522-1566年），廉州官府开辟了从冠头岭前往安南海东府、海阳府、新兴府等地的不定期直达海上航线，当时冠头岭一带已是“南北皆澳海船舫焉”，是商舶云集之地。清康熙二十二

年（1683年）七月，清廷平定台湾后，禁海及迁界取消，中外贸易又再度兴旺，据《廉州府志·度廉州海道》（乾隆版）载：那时的廉州“圣朝之威远播，薄海之风外洋，各国夷商无不航海梯山源而来，现在辐辏肩摩，实为边海第一繁庶地”。商路的畅通，为“海上丝瓷之路”的畅通，及瓷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。

2. 陶瓷烧造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，也是北海制瓷业及“海上丝瓷之路”繁荣的原因之一。

据《简明广东史》载：“明代，广东的陶瓷业也有很大的发展，窑址遍及全省各地……嘉靖前多为青釉瓷器，属叠烧；嘉靖后，开始烧制青花瓷，改用匣钵单件烧，器形制作精巧。”在北海下窑和岭底缸瓦窑的残窑堆中，也发现有匣钵等窑具。明中叶以后，由于航海技术及造船技术的进步，船舶的吨位在增大，对外航线也在增加。对外贸易的发展，促进了北海陶瓷业及“海上丝瓷之路”的繁荣。

3. 民间贸易逐渐取代了朝贡式的官方贸易，北海税率相对较低。

明中叶，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开始，持续1000多年的朝贡式官方贸易逐渐让位于民间贸易，即“易公贩而私贩”，有利于促进陶瓷等民间贸易的发展。此外，北海税率相对较低。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，根据中英《天津条约》附约规定，除丝、茶、鸦片外，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按“值百抽五”征税，即只征税5%。1876年中英《烟台条约》有特殊规定：“各口租界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。”但在北海，凡是外国商品运往内地，只交纳2.5%的子口税。由于北海口岸税率低，有利于外贸进出口，因而促进了北海制瓷业及“海上丝瓷之路”的繁荣。虽然明清时期有段时间实行海禁，但在巨大的商贸利润驱动下，民间海商走私贩运丝绸和陶瓷仍非常盛行。

总之，北海古窑址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创烧期，隋唐时期的发展期，宋元时期的兴盛期，及明清时期的延烧期，长期汲取和接纳南北良工之精华，在学习、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。北海古窑址的发展，与“海上丝瓷之路”的开拓和对外开放密切相连。北海古窑址凭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优势，通过“海上丝瓷之路”，拓展产品的销售市场和生存发展空间。北海口岸，通过“海上丝瓷之路”向东南亚、非洲和欧洲等地传播北海的陶瓷、丝绸等物质文化，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北海古窑址，为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为“海上丝瓷之路”的繁荣，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（作者系广西诗词学会原理事，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文学创作部副部长、理事）